

◀ (上接12版)

员,尤其太阳社的成员几乎都是中共党员。张小红认为,正是因为这两个文学社团的成员或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或是中国共产党的仰慕者,或本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共对左联的领导打下了思想基础。“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在左联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为什么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左联很快就能贯彻实行。”张小红写道。

1929年2月创造社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太阳社于同年底自动宣告解散。1930年,创造社的大部分成员与太阳社的全部成员加入左联,并成为左联成立之初的核心力量。根据1994年出版的姚辛编著的《左联词典》,在记录的288名左联盟员中,标明为共产党员的有131人。

为什么会在上海成立“左联”?

左联纪念馆的一楼展厅,是根据1930年3月2日左联召开成立大会时的原样布置的。讲解员介绍,此地原来是中华艺术大学的教室,现在的天花板和地砖都是当年开会时的旧物。当时参加成立大会的40余人,或站或坐地挤在这个小小的房间内,还有些人被挤出了房间,站在走道上、院子里趴着窗户、堵着门感受大会的盛况,聆听潘汉年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

如今,在展厅的墙上挂着7张照片,这是左联成立大会上选出的7名常委: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阿英)、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当时,鲁迅被尊为“盟主”,在会上作了题为《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第一次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及时介入,这样的情形哪怕在成立半年前,也是很难想象的。”左联纪念馆工作人员说,左联成立前两三年,创造社、太阳社打笔仗的主要攻击对象,正是鲁迅、茅盾等一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干将。

那么,这场论战是怎么开始的?事情还要从1927年说起。根据上海鲁迅纪念馆原馆长王锡荣的研究,那年10月,鲁迅、郭沫若相继来到上海。起初,他们俩和郑伯奇、蒋光慈等几位创造社成员,商谈要共同联名恢复被关停的创造社刊物《创造周报》。但就在这时,创造社内部发生了变故——一批刚

从日本回国的创造社新成员如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人,认为五四风云已经消散,五四新文化团体已经解体。他们将叶圣陶、郁达夫、鲁迅、郭沫若、张资平等一批五四时期有影响的作家,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尤其是“鲁迅这个旧的偶像,也到了该推倒的时候了”。创造社发起人成仿吾对鲁迅“猛攻”,他们还废除复刊前议,于1928年1月15日另立新刊《文化批判》。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个刊物中,竟然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批判鲁迅的。与此同时,太阳社也利用1928年1月1日创刊的《太阳月刊》,加入了声讨鲁迅的大军。

对正准备与创造社携手大干一番的鲁迅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来得莫名其妙的讨伐。一开始他选择沉默,但在连续被骂了一个月之后,1928年2月底他也拿起笔回击。根据地下党员楚图南的回忆,当时鲁迅在给北大教书时期的学生、中共党员任国祯的来信中,曾提到自己被围攻一事,并说那些人用满纸不易懂的新名词吓唬人,他希望对文艺理论比较了解的任国祯介绍一些书籍供他参考。后来任国祯和楚图南马上拟了个书目发去,供鲁迅参考。

看到鲁迅反击,创造社和太阳社又对他进行了更猛烈的攻击,但几乎都是没什么理论和分析的肆意谩骂,这就招致了一些文人和其他文学社团的批判,骂战陷入混战。后来,鲁迅写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章再度予以回击,郭沫若便写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构陷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法西斯蒂”,把这波乱骂的狂潮推向了高峰。在王锡荣看来,这场论战的核心人物是鲁迅和郭沫若,因为他们的骂战是最高级别也是最刺痛对方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最激励对方走向正确的方向,最具有建设性的”。

“最后,还是关注到这场论战的中共中央出手,制止了这场无谓的论战进一步恶化,并使双方走向联合。”王锡荣说,如果没有中共中央的阻止,这场论战的结局可能是持续混战,也可能逐渐平息,但不会真正平息,更不可能诞生左联这样汇聚左翼文学力量的组织。

那么,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干预这场白热化的论战呢?左联纪念馆研究人员告诉记者,这主要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迫切需要左翼作家们团结起来。而且从国际上来看,苏联的“拉普”(全称“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日

本的“纳普”(全称“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和“革命文学国际局”先后成立,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尽快帮助革命作家成立联合团体。

根据王锡荣的梳理,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后,中共代表团于11月回上海(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途中经过绥芬河、哈尔滨,周恩来、李立三等从时任中国哈尔滨县委书记任国祯的口中,听说了鲁迅被围攻的事情,并当场表态,认为创造社、太阳社这样围攻鲁迅不对。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周恩来来到上海后,即指示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富春:马上停止与鲁迅的论争,要与鲁迅联手组成统一的组织。于是李富春立即约谈了他派到创造社去的党员阳翰笙,让他劝说创造社、太阳社停止论争、实行联合,阳翰笙很好地执行了中央规定的任务。

这里有一则趣闻:1930年2月,正是这位华汉(即阳翰笙)写了《中国新文艺运动》,继续对鲁迅予以批判,称“鲁迅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这篇文章刊发在4月的《文艺讲座》上,这时距离左联成立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张小红认为,这种重叠交叉的情况,“说明当时革命文学倡导者对中共中央是非常信任和尊重的,或者说中共中央的威信是足以约束其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虽然他们个人在感情上与鲁迅还有齟齬,“但还是‘听党的话’,先在组织上联合起来成立左联再说”。

根据李立三的回,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他也直接参与处理了这件事。当时党内有些年轻人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李立三就找他们谈话。同时,他也去找鲁迅谈话,听取他的意见。李立三告诉鲁迅,他拟成立统一的革命文化组织,打算命名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对此,鲁迅不仅非常赞同,而且特别强调代表前进和革命的“左翼”两字旗帜鲜明,可以用。

根据夏衍的回忆,1929年10月的一天,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一次筹备会在上海北四川路与寰乐安路口的公啡咖啡馆以“文化人聚餐”为名义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潘汉年、冯雪峰、夏衍、阳翰笙、钱杏邨、冯乃超、彭康、柔石、洪灵菲、蒋光慈、戴平万,均为中共党员。当时筹备会一般是每周开1次,有时因需要仅隔两三天就会开1次,地点基本固定在公啡咖啡馆(现四川北路1903号,1995年因四川北路拓宽而拆除,2006



创造社于1928年1月15日另立新刊《文化批判》。太阳社1928年1月1日创刊《太阳月刊》(同年7月停刊,共出版7期)。《太阳月刊》与《文化批判》是当时提倡革命文学的主要刊物。



根据夏衍的回忆,从1929年10月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会基本固定在上海北四川路与寰乐安路口的公啡咖啡馆举行。



左联盟员王一榴参加左联成立大会后作的漫画,反映了成立大会的情景。



左辉在解放战争时期创作的油画《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讲话》

(下转14版) ➔